

のですが、時間が切れてしまいましたので、これで私の報告を終えたいと思います。

○座長 では、コメントに入りたいと思います。最初に臧志軍先生、お願いします。

---

## コメント

### 臧志軍（復旦大学）

---

谢谢主持人。刚才几位的发言非常精彩，我从当中学到了很多，有一些领域不是我熟悉的领域，所以，我这个评论有一些可能带有请教，或者谈一点自己的感想，学习的感想。金老师的报告，他从博莱尼一些核心范畴出发，就是“嵌入”这个范畴出发，指出市场经济等等这些东西从传统社会或者传统的一个整体化的有机体当中“脱嵌”，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宿命，没有办法摆脱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并且，他认为现代社会已经不是一个传统的有机体，这样的社会，也不可能再成为一个有机体。因此，要解决现代社会当中的那种不和谐，那种矛盾的话，就是只能在现代性的基础上找出路。我认为，他的这个观点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非常具有启发性的。金老师并且提示在现代社会当中，已经出现了对现代社会的一些价值已经出现了一些修正的动向，比如说对民族主义的纠正，比如说对个人主义个人权力的修正，讲到了这些方面的问题，我认为是非常有启发的。我想请教的，实际上有这么两个问题，一个是这种修正它的动力来自于何处？就是这种修正是人类社会自我进行的一种修正，这种动力的来源如果是来自于人类自身的话，是不是可以认为就是说人类社会当中的某一些结构某一些东西它是不会脱嵌，有没有这样的地方？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今天讲到了价值的修正，比如讲到了 Rawls 的正义论，我的问题是，Rawls 是一个政治哲学家，他的这种正义论在政治层面，或者说在操作的层面是不是可能？当然这个已经超出了今天研究的范围。Rawls 认为，所谓公平正义是指所有的好的东西都应该平均分配，除非有利于地位最弱的人。按照我的理解的话，这种标准在一个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比如在一个家庭当中，是不难实现的。比如说一个三口之家，有个小孩，今天晚上的晚餐怎么安排，这个当然不会平均的分配，小孩很小他不能吃很多东西。但他会有一个分配，夫妻双方认为这个孩子是

一个弱势群体，然后我们会给他一些照顾。但是在一个社会当中，谁来认定谁是弱势群体，然后，谁来认定这个群体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需要何种程度的帮助？我就觉得 Rawls 的这个概念在操作当中，是很困难的。如果可能的话，请金老师谈谈您的想法，这是提出的问题。

第二是关于刘老师的论文。刘老师的论文就是从对概念的定义，即从词源，以及它们在近代的变化展开分析。通过这样一种研究方法的展示，她向我们提示了一个研究方面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概念的定义和它的使用，它的变化，以及它同文化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提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注意概念以及概念的变化，它的内涵的变化。第二，刘老师指出，目前在中国所谓“和谐”这个观念，它的价值指向是含糊的。对于这一点我非常同意，我觉得非常精辟。并且，刘老师指出“和谐”的观念必须在现代的价值系统当中，也就是在一个宪政的架构当中才能够找到它的恰当定位。我认为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顺着刘老师所展示的研究方法，我想讲的是，我们在研究公共政策问题时，要特别注意对于问题本身的定义。我们今天从上午开始，实际上从昨天开始，讨论环境问题等等一些问题。有些学者试图给政府开药方，指出在政策的层面应该怎么来做。我认为，如果涉及到要开“药方”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做一项工作，我们要对问题作进一步的定义，要明确化。比如说我们要解决的当然不是“失业现象”，而是“失业问题”，那么，什么是“失业问题”？城镇登记失业率超过多少算是“失业问题”，对此，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要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义。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开药方。如果我们只是公众议程的层面讨论这些问题，那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如果要开“药方”的话，则需要对于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定义。这是我受刘老师的方法论启发所谈论的一点感想。顺着这一点，我还要指出一个现象，我们

这个会议的题目中有“和谐社会”的概念。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以后“和谐社会”的概念用得好像不是太多了，现在用得比较多的是“促进社会和谐”。原来中共中央有一个文件，名叫“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议”，在那段时间“和谐社会”这个概念的使用是非常频繁的。我们看电视报道，领导人出去都是讲要建设“和谐社会”。但是十七大以后发生了变化。当然，十七大报告中还用这个概念。刚才上午我查了一下，大概用了7次，但是好像不是太频繁。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呢？当初提出“和谐社会”的时候，在复旦一些老师当中有一些议论，这个和谐社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的历史的定位是什么？比如说，过去“十六大”提“小康社会”，现在讲“和谐社会”。这是一方面的问题。第二方面的问题就是昨天我们讨论的和谐社会可不可能的问题。在我看来，和谐社会这个目标是需要的是达不到的，它不可能实现。和谐社会有没有可能？我认为不可能。促进社会和谐有没有可能？这是可以操作的，是有可能的，通过政策是可以操作的。我是顺着刘老师的方法，对于“和谐社会”这个概念及其演化等作上述说明。总之，对于“和谐社会”这一概念，过去有些议论，十七大以后这个概念使用频率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了。

许先生是当今中国近现代思想政治研究的代表性人物，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和研究方法，在我看来就是好像反映了许老师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某种延伸和拓展。在中国，像许老师讲的那样，很多人奉行金钱崇拜、物质主义，但是同时也有很多人去相信宗教。我想，在人员构成上，这两部分人中有很大部分是相互重叠的。我想问的是，调查中是怎样去识别这个人、还是不是宗教信仰者的？

张玉林教授的报告，语言尖锐，充满激情。他说，中国工业化所引起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已经

不仅仅是危机，而且是对中国自然的全面战争，并且中国需要一次革命，要求生存权的社会革命。我想，我们现在确实需要使用这样的语言来做这样程度的强调。确实，这个问题背后和政治关系非常密切。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更加需要是政治层面的努力。政治就是分东西，伊斯顿（David Easton）讲，政治就是对大家想要的东西做权威性的分配。实际上，当在对伊斯顿所说的“大家想要的东西”做权威性的分配的时候，也在对代价——即“大家不想要的东西”做权威性的分配。张老师给我们展示了环境代价是怎么分布的。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分布状态呢？这就是政治层面有问题了。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想需要的不仅仅是政策层面的努力，政治层面的努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毛里先生是日本的中国研究界的一位前辈，她的研究成果一直给我们以很大的参考。毛里先生的研究方法近年来似乎在趋向于结构的分析和多角度的量化分析。毛里先生在她的论文中提出了现代中国分析的四种模式，她说她没有结论。但是我在想，这个逻辑的结论应该是什么？过去人们研究中国，要么说它是黑的，要么说它是白的。现在发生了变化。现在的研究者认为，从白到黑，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像是一个光谱。民主，也像一个光谱，比如说中国排名第几第几。可能结论就是这么一个结论，结论可能就是毛里先生最不喜欢的那个模式，即——“中国”就是“中国”。当然，我想即使是这么一个结论也没有关系，毛里先生在中国研究方面是非常有造诣的。

我再讲一句话，加加美老师，他是我的老师，他的文章、还有我和他的交流总是能给我很多启发。非常感谢这次您又贡献“开发政治”这个概念，我认为这个概念非常非常重要，谢谢！

○座長 それでは、最後に張琢先生にお願いします。